

种粮大户农内服务型创业：特征及决定因素

——基于资本禀赋的视角

曹铁毅 邹伟¹

【摘要】种粮大户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对于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增加收入和完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多个维度分析了种粮大户农内服务型创业的特征，然后将创业分为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构建了资本禀赋影响创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说，并利用江苏省 472 户种粮大户调查数据，采用 Heckman 选择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看好服务市场发展”和“拓宽增收渠道”是主要创业动因，服务范围以本村为主，服务对象以小农户为主，服务内容以耕种环节为主，服务规模比较适当以及服务收入可观是重要特征。②资本禀赋对农内服务型创业影响显著。其中，经济资本中农机投资价值对创业决策和创业规模均有促进作用。农地面积对创业决策有抑制作用，但对创业规模有促进作用。社会资本中，本地人身份对创业决策有促进作用，加入合作社对创业规模有促进作用。文化资本中，农业技术培训次数对创业决策和创业规模均有促进作用，而规模经营年限仅对创业决策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种粮大户 农内创业 农业社会化服务 资本禀赋

【中图分类号】F3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2)-07-0113(09)

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①近年来，农民创业在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动农村双创活动，特别是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也明确指出，鼓励农民就地创业、返乡创业，加大对农民创业的支持力度。农民创业不但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也可以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其他主体的收入。^②同时，对于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等均具有积极影响。^③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农民创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创业可以分为农业内部创业（以下简称农内创业）和非农业创业。^④已有研究多关注农民的非农创业行为，而对农内创业关注明显不足。^⑤农内创业是指在传统农业领域增加经营规模、采用新技术、组建新组织以及开展新服务等改进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⑥具体可以分为生产型创业、加工型创业、营销型创业和服务型创业四类，其中，服务型创业作为农民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投资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活动，^⑦在四类创业中发展势头良好且与国家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相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2021 年进一步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另外，研究也表明，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缓解农户面临的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资源禀赋约束，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途径。^⑧

实践中，种粮大户是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的重要主体。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不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收入，

¹作者简介：曹铁毅 博士研究生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邹伟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机制研究”（编号：18AGL014）的阶段性成果。邹伟系本文通讯作者。

⁽⁹⁾而且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多形式、多主体竞争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等均有积极影响。⁽¹⁰⁻¹¹⁾那么，当前种粮大户的服务型创业呈现出何种特征？进一步其参与服务型创业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目前，仅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种粮大户的农内服务型创业行为。如杜志雄研究认为，当前家庭农场在发挥生产功能的同时，也发挥着服务功能，形成了经营和服务双主体地位。⁽¹²⁾张晖等调查发现，种粮大户拥有农机且提供服务的比例已经达到 58.79%，加入合作社可以使其提供服务的概率提高 12.5%。⁽¹³⁾上述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第一，鲜有文献对种粮大户的创业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其参与服务型创业的主要动因是什么，服务内容及服务对象等表现如何值得深入研究。第二，已有文献对种粮大户参与创业的形成机制分析不足，且多以案例分析、理论阐释为主，缺乏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利用江苏省 472 户种粮大户调查数据，从多个维度系统概括种粮大户农内服务型创业的特征表现，并进一步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从资本禀赋的视角分析创业的决定因素。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对种粮大户创业特征的系统分析，可以对其创业全貌进行整体把握。第二，基于资本禀赋的视角对创业的形成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对于鼓励农民参与服务型创业以及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等具有指导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认为，实践活动是“主观建构”和“客观结构”双重作用的过程，人们的实践行为受到场域、惯习和资本的交互影响。”⁽¹⁴⁾种粮大户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同样会受到场域、惯习和资本的多重影响。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既定的场域和行为惯习下，种粮大户所拥有的资本禀赋如何影响其农内服务型创业行为。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组可以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资本状况会影响主体的行为选择。因此，本文将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文化资本三个方面分析资本禀赋对种粮大户创业的影响。

1. 经济资本与农内服务型创业

布迪厄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经济条件的约束下进行，不可能随心所欲做出行为选择。经济资本作为基础性资本，是指人们所拥有的可以变现的各类财物和财产的总和，它会在特定的场域下促使人们形成“理性”的惯习，从而影响行为决策。农户进行服务型创业的前提是拥有先进、大型的农业机械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机驾驶、维修等人力资本。由于种粮大户具有规模优势，其经济资本越丰富，就越容易以较低的成本引入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装备等，增强服务供给能力，形成服务供给优势，从而有助于参与服务型创业。如研究发现正规信贷约束会抑制农户的农机投资行为，⁽¹⁵⁾而农户的借贷行为会激励其进行农机等长期投资，⁽¹⁶⁾且借贷规模越大的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概率越高。⁽¹⁷⁾

由此，提出假说 1：经济资本对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存在正向影响。

2. 社会资本与农内服务型创业

社会资本是指由个体所占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资源集合。⁽¹⁸⁾已有研究多采用政治身份（如党员、村干部）、本地关系（是否为本地人）以及组织参与（如加入合作社）等刻画农户的社会资本。⁽¹⁹⁻²⁰⁾结合此衡量方式，社会资本对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基于熟人社会和政治身份的优势，种粮大户具有社区亲和性，他们提供服务能够获得周围农户的信任和支持，⁽²¹⁾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反馈（如个人声誉）。⁽²²⁾第二，加入合作社等提高组织化程度，既有利于信息传递，促进服务需求者和供给者有效对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种粮大户也能够为组织内成员提供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李东轩研究发现，以本地关系和村干部经历表征的社会资本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深层因素。⁽²³⁾张晖等研究也表明，加入农业合作社能够显著提高种粮大户进行服务型创业的概率。⁽²⁴⁾

由此，提出假说 2：社会资本对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存在正向影响。

3. 文化资本与农内服务型创业

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源积累的结果，可以划分为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类型。⁽²⁵⁾在具体研究中，农户的文化资本常用农业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等来表征。文化资本对创业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和发掘能力就越强，同时，对相关扶持政策的把握以及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能力也越强，有利于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创业信息和创业资源的获取。有学者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有助于提高农户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²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的创业能力、交流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因此，也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创业政策支持。⁽²⁷⁾另外，徐密等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接受新事物的意愿以及掌握新知识的能力更强，所以其更倾向于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²⁸⁾二是通过农业技能培训、“干中学”等，有助于农户的技术积累以及经营管理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其服务型创业奠定技术和经验基础。如曹铁毅研究发现，对家庭农场主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有助于将新技术、新装备等导入其生产过程中，形成创业的资源基础，激发其服务型创业行为。⁽²⁹⁾

由此，提出假说 3：文化资本对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存在正向影响。

三、计量识别策略、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 计量识别策略

种粮大户的农内服务型创业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创业决策，第二个阶段为创业后的创业规模。这两个阶段存在先后顺序，如果直接运用 OLS 方法进行估计则会存在样本选择偏误。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在纠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本文采用该模型分析种粮大户的创业行为。Heckman 模型的第一个阶段是采用 Probit 模型描述实质性的决策行为，估计参与概率。第二个阶段采用 OLS 回归模型，估计参与效果。

首先，利用 Probit 模型分析种粮大户参与创业的概率及影响因素。模型设定如下：

$$Y_{1i} = \alpha_1 + \alpha_{1i}X_{1i} + \epsilon_{1i} \quad (1)$$

其中， Y_{1i} 表示创业决策，如果参与创业，则 $Y_{1i}=1$ ，反之， $Y_{1i}=0$ 。 X_{1i} 表示影响创业决策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解释变量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 ϵ_{1i} 为误差项， α_1 和 α_{1i} 表示参数的估计值。为了有效识别方程，创业决策模型中，需要包含一个只影响创业决策而不影响创业规模的变量。为此，本文选取“种粮大户否有农机手经历”作为识别变量，该变量会直接影响创业选择，但不会影响创业后的创业规模。

考虑到 OLS 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因此需要从 Probit 模型中得到逆米尔斯比率作为工具变量：

$$\lambda_i = \frac{\varphi(\alpha_{1i}X_{1i})}{\Phi(\alpha_{1i}X_{1i})} \quad (2)$$

其中， $\varphi(\alpha_{1i}X_{1i})$ 和 $\Phi(\alpha_{1i}X_{1i})$ 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和累计分布函数。

第二个阶段利用参与创业的样本，采用 OLS 模型估计种粮大户创业规模的影响因素，同时带入逆米尔斯比率入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模型设定如下：

$$Y_{2i} = \beta_2 + \beta_{2i} X_{2i} + \delta_{2i} \lambda_i + \mu_{2i} \quad (3)$$

其中, Y_{2i} 以为第二阶段的因变量, 用服务面积表示创业规模。 X_{2i} 包括种粮大户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控制变量。 X_{2i} 包含于 X_{1i} 之中。 λ_i 为逆米尔斯比率, δ_{2i} 为其待估参数, 如果 δ_{2i} 非零且显著, 则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使用 Heckman 模型有效。 μ_{2i} 为误差项。 β_2 、 β_{2i} 分别为参数估计值。

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1 年 1~4 月在江苏省开展的入户调查。江苏省是中国农业大省, 近年来, 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十分迅速, 同时该省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的比例也较高, 因此, 可以为本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撑。调查过程采取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做法是, 首先, 选择南京市、镇江市、淮安市以及扬州市作为调研区域, 然后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等, 在每个市抽取 2 个县/区, 每个县/区抽取 2 个镇, 每个镇抽取 4~5 个村, 最后在每个村随机抽取 8~10 个农户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种粮大户家庭基本情况、农地经营情况、生产服务外包情况以及农内服务型创业情况等方面。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29 份, 回收有效问卷 601 份, 有效率为 95.55%。本文将经营规模大于 30 亩的界定为种粮大户, 有效问卷中共有种粮大户 472 份, 因此, 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为 472 个。

3. 变量选取

(1) 农内服务型创业。按照创业选择过程, 将农内服务型创业分为两个变量, 分别为创业决策和创业规模, 其中创业决策为二元虚拟变量, 创业规模为连续型变量, 用服务面积表征。实践中, 种粮大户的农内服务型创业内容主要表现为提供农机服务。因此, 问卷设计了包含水稻和小麦两种作物的耕、种、防、收不同环节的服务内容, 如果种粮大户提供其中某类作物的某一环节的服务, 则视作具有服务型创业行为。有服务型创业行为的赋值为 1, 反之赋值为 0。对于有服务型创业行为的种粮大户又进一步统计了其对不同作物、不同环节的服务面积。由于不同环节的作业难度和成本存在显著差异, 计算总服务面积时不能进行简单相加。本文借鉴韩春虹等的研究, 总服务面积由耕、种、防、收四个环节加权计算得出, 具体公式为: 总服务面积 = $0.36A_1 + 0.27A_2 + 0.1A_3 + 0.27A_4$ 。 A_1 、 A_2 、 A_3 、 A_4 分别为耕、种、防、收环节的服务面积, 对应的权重分别为 0.36、0.27、0.1、0.27。

(2) 资本禀赋。资本禀赋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方面。经济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农业资本两个方面。其中, 金融资本用信贷约束表征, 包括需求型信贷约束和供给型信贷约束, 借鉴黄速建等的研究, 需求型信贷约束定义为面临资金短缺, 但是未向金融结构申请贷款, 而供给型信贷约束是指存在资金短缺且向金融机构申请了贷款, 但是获得的金额少于申请金额。⁽³⁰⁾ 农业资本包括农地面积和农机投资价值两个变量。农地面积和农机投资价值可以反映种粮大户农业资本的丰裕度, 经营农地面积越大、农机投资价值越高, 说明生产资源越丰富, 经济资本越高。结合种粮大户特征, 选择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是本地人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来表征社会资本。⁽³¹⁻³²⁾ 三个变量分别可以反映种粮大户的政治型社会资本、地缘性社会资本以及组织型社会资本情况。文化资本选取受教育程度、农业技术培训次数以及规模经营年限来表征。其中, 受教育程度是正规受教育经历的直接表现, 用实际受教育年限表示, 可以衡量种粮大户的通用型文化资本。农业技术培训和规模经营年限作为专用型文化资本, 可以体现“干中学”效应, 能够反映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丰裕度。

(3) 控制变量及识别变量。农户行为之间具有相互模仿的特征, 村庄内一个农户的创业成功可能会激励其他农户也加入创业行列, 尤其是在农机服务领域, 一个村庄的几个农户组团提供跨区服务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 本文引入村庄内的服务组织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另外, 选取种粮大户是否有农机手经历作为识别变量。变量的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说明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内服务型创业	创业决策	提供服务	是=1;否=0	0.439	0.497
	创业规模	服务面积	根据公式计算获得: 亩	431.672	1723.356
经济资本	金融资本	需求型信贷约束	是=1;否=0	0.138	0.345
		供给型信贷约束	是=1;否=0	0.102	0.303
	农业资本	农地面积	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 亩	332.138	678.745
		农机投资价值	机械投资价值: 万元	27.813	51.696
社会资本	地缘型社会资本	是否本地人	是=1;否=0	0.807	0.395
	组织型社会资本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1;否=0	0.244	0.430
	政治型社会资本	是否村干部	是=1;否=0	0.229	0.421
文化资本	通用型文化资本	受教育程度	实际受教育年限: 年	8.752	3.305
	专用型文化资本	农业技术培训	近三年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 次	5.025	6.222
		规模经营年限	规模经营的实际年限: 年	8.911	6.261
控制变量 识别变量		村内服务组织数量	村内提供农业服务的组织数量: 个	8.456	5.975
		农机手经历	是否有农机手经历: 是=1;否=0	0.799	0.401

四、种粮大户农内服务型创业特征分析

基于对样本的统计分析(表 2),将种粮大户的农内服务型创业特征总结如下:

1. 服务动因:“看好服务市场发展”和“拓宽收入渠道”是关键诱因,同时,“互帮互助”也是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创业原因中“看好服务市场,有利可图”“只种地收入太低,想拓宽收入渠道”占比最高,分别为 65.00%和 51.21%。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购买服务即以资本替代劳动成为农户节约生产成本的理性选择。而在此过程中,农户的服务需求会不断释放并聚合成巨大的服务市场,从而会诱导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种粮大户提供服务,分享市场红利。另一方面,在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种粮大户的农地规模经营收益表现不佳,这也是激发其进行创业增收的重要动因。此外,也有 34.30%的种粮大户由于“相互帮忙”而提供服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熟人社会“声誉机制”的作用下种粮大户会以优惠价格为周边小农户提供服务,解决小农户服务获取难、服务价格高等问题。另一个是种粮大户之间也会共享资源、相互帮忙,减少重复投资。

表 2 样本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特征 单位: %

	统计指标	比例		统计指标	比例
服务动因	看好服务市场	65.00	服务内容 (数量划分)	3 个环节	15.94
	拓宽收入渠道	51.21		4 个环节	11.11
	农机折旧严重	6.28	服务面积	100 亩以下	23.67
	相互帮忙	34.30		100 (含) ~ 300 亩	26.09
服务范围	本村	77.78		300 (含) ~ 500 亩	12.08
	本乡镇	47.34	服务收入	501 亩及以上	38.16
	本县其他乡镇	15.94		1 万以下	20.77
	县外	11.11		1 万 (含) ~ 3 万	25.12
服务对象	小农户	56.21		3 万 (含) ~ 5 万	16.43
	规模户	43.79		5 万及以上	37.68
服务内容 (环节划分)	耕	64.73	未来服务 意愿	不提供了	6.76
	种	56.04		减少服务	3.38
	防	31.40		维持不变	40.10
	收	43.00		增加服务	49.76
服务内容 (数量划分)	1 个环节	43.00			
	2 个环节	29.95			

注：服务动因、服务环节问题设置为多选，所以其比例之和不等于 100。

2. 服务范围：以本村为主，同时兼顾镇域内其他村，跨区作业少

从服务范围看，在进行服务型创业的种粮大户中，为本村提供服务的比例达到 77.88%，其次为本乡镇，占比为 47.34%。说明，种粮大户服务范围主要在镇域内，尤其以本村域为主，进行跨区作业的较少。这也印证了仇叶所言的，以村庄为基本服务场域的内生型服务主体的兴起，将在推动小规模土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³³⁾

3. 服务对象：以小农户为主，同时兼顾规模户

种粮大户的服务对象中小农户占比达到 56.21%，规模户占比为 43.79%，即其服务对象具有以小农户为主，同时兼顾规模户的特征。结合上述服务范围以本村农户为主的特征，可知种粮大户的服务对象主要以本村的小农户为主，这与杜志雄等的发现是一致的。⁽³⁴⁾ 种粮大户多由小农户发展而来，它们根植于农业、农村，具有贴近小农户、服务小农户的优势，将作为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外，种粮大户之间基于农机资源等差异会形成各自比较优势，这使得他们也会相互服务，既可以增加收入，也可以有效避免购置全部农机造成的资源浪费。

4. 服务内容：以耕种环节为主，涉及的服务环节少

服务内容主要从环节内容和环节数量两方面进行比较。内容方面，种粮大户提供较多的服务为耕地和播种（插秧环节），占比分别为 64.73% 和 56.04%，其次是收割和病虫害防治，占比分别为 43.00% 和 31.40%，即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中耕种环节。另外，仅有小部分种粮大户购置了烘干和加工设备，所以提供服务的比例很低，占比不超过 5%，说明种粮大户提供的产后服务十分有限。从环节数量看，仅提供 1 个环节的占比最高，为 43.00%，其次为 2 个环节，占比为 29.95%，再次验证了种粮大户的服务创业内容主要集中在耕种环节，涉及到服务环节少。

5. 服务面积：服务面积比较适当

从服务面积区间看，服务面积为 300 亩及以下和 300 亩以上的占比分别为 49.76%和 50.24%，几乎相当。说明种粮大户的服务面积分布比较均衡，实现了自身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从经营规模与服务面积的比较来看，参与创业的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均值为 435 亩，而其服务面积均值达到 984 亩，服务面积是经营规模的 2 倍，进一步说明了参与服务型创业对种粮大户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以及种粮大户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6. 服务收入：服务收入可观

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的目的在于增加收入。从收入区间看，5 万以上占比最高，为 37.68%，服务收入在 3 万元以上的占比达到 54.11%，平均服务收入为 7.72 万元，说明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绩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单一农地规模经营下的低收益困境。另外，从未来服务提供意愿看，有近 50%的种粮大户表示会增加服务，近 90%的种粮大户表示会保持现状或增加服务，进一步从侧面反映了农内服务型创业前景较好，可以获取可观收入。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资本禀赋各测度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采用 stata14.0 软件对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1.53，平均为 1.21，远小于 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共线性。另外，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使用 Heckman 模型有效。因此，可以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表 3）分析种粮大户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两阶段决策的影响因素。

1. 经济资本的影响

选择模型中，农地面积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经营的农地面积越大，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的概率越低，与假说 1 不符。主要原因是，农地面积越大，种粮大户家庭农业机械的生产能力剩余就越少，同时家庭劳动力配置于对外服务方面的时间供给也相对有限，即随着农地面积的增加，家庭资源如农业机械、劳动力将主要以内部使用为主，所以会负向影响其服务供给行为，不利于服务型创业。而在规模模型中，农地面积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假说 1 一致。合理的解释是，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其服务能力也会得到增强。以农业机械为例，调查数据显示，农地面积在 100 亩以下、100（含）~300 亩、300（含）~500 亩以及 50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购置的农机种类分别为 2.16、2.79、3.11、3.58，农机台数分别为 4.35、8.28、9.44、20.76，农机投资价值（万元）分别为 18.76、37.68、43.99、103.87，即在农地面积增加的同时，种粮大户所拥有的农机种类、台数以及总价值都会显著增加，这增强了其服务能力，有助于扩大服务面积。

农机投资价值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种粮大户的创业决策和创业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与假说 1 一致。农机投资价值对创业有积极影响。其作用机制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农业生产具有典型的季节性特征，农户对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农业机械进行投资，会产生专用性准租，易导致农业机械的低效利用与闲置浪费。因此，为提高作业密度和频率、减少设备的空置损耗以及缩短投资回收期等，种粮大户会向外部的其他主体提供服务，⁽³⁵⁾从而“被动”进行创业。二是从资源优势的角度看，种粮大户购置的农业机械多以大型农机为主，具有作业效率高和服务能力强特征。因此，在完成内部生产的同时，丰富的资源基础和较强的服务能力会形成其提供服务的资源优势，从而会激发其“主动”进行服务型创业。另外，种粮大户的创业规模随着其农机投资价值的增加而扩大，是因为服务面积与服务供给能力息息相关，种粮大户投资的农机价值越大，其完成内部生产后的生产力剩余就越多，从而能提供更大的服务面积。

2. 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中本地人身份对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影响显著为正，即与外生型种粮大户相比，内生型种粮大户参与创业的概率更高。说明地缘型社会资本能促进种粮大户参与创业，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致，⁽³⁶⁾假说 2 得到验证。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从服务对象需求端看，结合现实观察，当前种粮大户提供服务的对象主要以熟人社会内的周边农户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有本地身份的种粮大户具有社区亲和性优势，因此他们提供服务更能得到农户的信任和支持，这可以称之为需求端拉力。从种粮大户服务供给端来看，有本地身份的种粮大户对本地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状况更了解，对周围农户的服务需求更熟悉，这有助于其识别并把握机会。另外，本地身份也有助于其在创业过程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和政策扶持，因此，具有参与服务型创业的内在动力。

社会资本中的组织型社会资本（例如加入合作社）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虽为正，但不显著，而对创业规模的影响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假说 2 一致。合理的解释是，农内服务型创业的门槛相对较低，拥有一定的农业机械和操作技能，就有机会成为服务提供者。但在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农户靠单打独斗很难有效增加服务规模，扩大市场份额，而提高服务组织化程度显得尤为关键。通过加入合作社，种粮大户可以抱团取暖和资源共享，在相互服务中增加各自的服务面积，另外提供服务的大户还可以组团为外部其他主体提供服务。由于合作社在信息收集与传递、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供需主体对接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增加单个主体的服务面积。

3. 文化资本的影响

农业技术培训次数对种粮大户的服务型创业选择和创业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说 3 得到验证。说明参加的农业技术培训次数越多，种粮大户参与农内服务型创业的概率越高，提供的服务面积越大。原因是，当前针对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在提升主体经营管理、技术应用、市场参与等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能力有助于主体拓展经营内容、进行创新创业。另外，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看，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技术学习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如农机驾驶技术。且类似技术学习投入越多，形成的资产专用性越强。所以，为提高专用性资产的利用效率，种粮大户也具有服务创业的动力。

另外，规模经营年限越长，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的概率越高，假说 3 进一步得到验证。其解释是，规模经营年限越长的种粮大户农业生产经验比较丰富，同时对于农业服务市场的供需状况也比较熟悉，从而在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户普遍具有外包服务需求的背景下，丰富的农业从业经验有助于其把握市场机会，进行创新创业。

表 3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选择模型		规模模型	
经济资本	需求型信贷约束	0.134	0.190	-176.914	410.465
	供给型信贷约束	0.320	0.225	-536.826	450.521
	农地面积	-0.000***	0.000	0.619***	0.193
	农机投资价值	0.020***	0.003	23.435***	3.425
社会资本	本地人	0.308*	0.179	352.069	385.457
	加入合作社	0.094	0.175	687.489**	340.307
	村干部	-0.105	0.167	-75.592	345.558
文化资本	受教育程度	0.031	0.023	-7.941	48.133
	农业技术培训次数	0.032**	0.014	39.584*	23.899
	规模经营年限	0.038***	0.011	16.103	25.135

控制变量	村内服务组织数量	0.023**	0.011	73.465***	24.438
	农机手经历	0.704***	0.185		
逆米尔斯比例 ^(λ)		1774.437*** (539.370)			
常数项		-2.331***	0.343	-3054.726***	1073.100
观测值		472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六、政策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第一，鼓励种粮大户参与服务型创业，将其作为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当前在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下种粮大户增收困难，而其参与服务型创业不但能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增加内部收入，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此，在今后培育种粮大户的过程中可鼓励其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服务型创业。更为重要的是要转变思路，改变对种粮大户单一粮食生产者和服务需求者的刻板印象，也将其视为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发挥其贴近小农户、服务小农户的优势，带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第二，重视资本禀赋对种粮大户服务型创业的影响，加强其资本禀赋的积累。首先，在经济资本方面，鼓励其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探索“农机补贴+服务补贴”相结合的补贴方式，提高种粮大户的农机装备水平和服务型创业的能力和动力。其次，要发挥好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保障作用，社会资本方面，鼓励本地种粮大户利用利用熟人社会优势等参与创业活动。另外，通过提高种粮大户的组织化程度，如组建合作社、服务联盟，丰富其组织型社会资本，提高市场参与能力和开拓能力。文化资本方面，有效开展农户急需的、针对性强的农业技术培训，如无人机驾驶与大型农机保修、土肥培育，提高种粮大户的农业技术水平。同时，通过完善流转合同等保障种粮大户的稳定和连续性经营，促进生产经验积累和文化资本提升。

参考文献：

- (1) Klapper L F, Lov e 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ies[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1, (03).
- (2) Mel S, McKenzie D, Woodruff C. Returns to Capital in Micro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04).
- (3) 张应良. 中国农户创业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6.
- (4) 罗明忠, 陶志. 农地资源禀赋对农民农内创业选择影响[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 (02).
- (5) 郭钺. 中国农民涉农创业——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9.
- (6) 苏岚岚, 孔荣. 农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决策了吗？——基于三省 1947 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J]. 经济评论, 2020, (03).
- (7) 彭艳玲, 苏岚岚, 孔荣. 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鲁、豫、陕、甘 4 省 1373 份农户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 (12).

-
- (8) 杨子, 饶芳萍, 诸培新.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农户土地转入视角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03).
- (9) (13) (24) 张晖, 吴霜, 张燕媛等. 加入合作社对种粮大户农机投资及服务供给行为的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 (02).
- (10) (12) (35) 杜志雄, 刘文霞. 家庭农场的经营和服务双重主体地位研究: 农机服务视角[J]. 理论探讨, 2017, (02).
- (11) 曹铁毅, 周佳宁, 邹伟. 家庭农场兼职化服务: 生成逻辑与影响效应[J]. 农村经济, 2021, (05).
- (14) (25) Bourdieu P.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 (15) 柳凌韵, 周宏. 正规金融约束、规模农地流入与农机长期投资——基于水稻种植规模农户的数据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09).
- (16) 胡雯, 张锦华, 陈昭玖.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投资激励: “短期化”抑或“长期化”[J]. 财经研究, 2020, (02).
- (17) (29) 曹铁毅, 周佳宁, 邹伟. 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农机服务选择——基于服务需求与供给的二维视角[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4).
- (18) 李晓平, 谢先雄, 赵敏娟.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07).
- (19) (23) (32) 李东轩, 刘平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J]. 资源科学, 2019, (11).
- (20) 曹铁毅, 王雪琪, 邹伟. 家庭农场测土配方施肥行为分析——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05).
- (21) 胡凌啸, 武舜臣. 土地托管的内涵与实现: 理论剖析与实践归纳[J]. 经济学家, 2019, (12).
- (22) (37) 钟真, 谭朝琳, 穆娜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研究——基于京郊农村的调查[J]. 中国软科学, 2014, (08).
- (26) 高静, 张应良. 农户创业: 初始社会资本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研究——基于 518 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 (01).
- (27) 陈昭玖, 朱红根.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支持的可获性研究——基于江西 1145 份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05).
- (28) 徐密, 黄治鹏, 杨志海. 农机户农机服务供给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规模差异的视角[J].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0, (03).

-
- (30) 韩春虹, 张德元. 土地托管影响粮食产出的内在机制及效率制约因素[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03).
- (31) 黄速建, 刘美玉. 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有差异吗[J]. 财贸经济, 2020, (09).
- (33) 刘可, 齐振宏, 黄炜虹等. 资本禀赋异质性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02).
- (34) 仇叶. 小规模土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选择与实现机制对基层内生机服务市场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02).
- (36) 王全忠, 周宏. 农业生产性投资、流转租期与效益追求方式[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5).